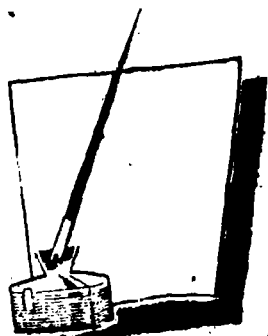


近代海外印、移民的比较研究

■ 郭 梁



移民或人口迁移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奇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民族迁徙或人口迁移无论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或是在国与国之间，都是屡见不鲜的。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曾出现过几次跨越国界、洲界的移民浪潮。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更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国际移民浪潮。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移向美洲、澳洲的移民达到4 500万人至5 000万人左右，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洲移民总数亦达到5 000万人以上，与欧洲移民的数量不相上下，在近代世界移民史上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个偏向。一是在传统上从来比较注重欧洲移民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与欧洲移民规模不相上下的亚洲移民则缺乏研究，有的研究甚至连亚洲移民的事实也没有注意到，^①似乎一谈到移民就是指欧洲移民迁移到新大陆，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深。另一种偏向是忽视了在世界移民史的总体范围中去考察研究国别或地区移民，往往把移民史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海外延伸内容去研究，只偏重于从移民国的内部因素去探讨移民诸问题，结果也同样限制了对一个国家移民问题本质的认识。例如有学者在谈到中国近代移民高潮时认为：“1842年之后华人的大量移民，无论如何，并非由于英人和其它欧洲人独特的活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本身的崩溃。”^②显然，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对近代中国移民出现所发生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值得商榷。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移民浪潮，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出现的孤立现象，而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探讨近代移民的原因以及移民的性质、特点，都不能不放在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进

程中去研究；因而首先应该弄清近代移民浪潮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帝国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必然关系。同时，研究近代移民亦应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影响。

针对以上两个偏向，本文以中国、印度、日本三种不同类型的移民为例，进行分析比较，既探讨亚洲移民在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地位，又探讨亚洲移民的根本原因和性质、特点。

一、殖民地移民类型——印度移民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对外交流的历史，因此印度人出国的历史亦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历史，但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移民，则开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9世纪后半期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移民达到了高潮阶段。据统计，1834年至1937年的百余年中，印度的海外移民总数达到3 019.1万人，其中1834年至1860年的印度移民为171.2万人，每年平均移民65 846人，而1861年至1937年的76年间，印度移民达到2 848万人，年平均移民数达37 4737万人，^③成为亚洲最大的移民国家。（参见第一表）

第一表 印度移民人数 （单位：千人）

年 份	出国人数	归国人数	净移民数
1834—1860	1712	1230	481
1861—1870	1769	1372	396
1871—1880	2740	2191	549
1881—1890	3006	2412	593
1891—1900	4288	2804	1484
1901—1910	3292	2439	854
1911—1920	4570	3735	835
1921—1930	6060	5073	988
1931—1937	2755	2848	-93
合 计	30191	24104	6087

资料来源：Davis: The Popul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Princeton, 1951, 第99页。

印度之所以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向外输出劳动力，到19世纪后半期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完全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第一，从国际背景来看，以1833年英国颁布南美殖民地解放奴隶法令为肇始，法国于1848年、秘鲁于1855年、美国于1860年、荷兰于1863年、西班牙于1870年都先后废除了奴隶法令。为了填补奴隶劳动力的“真空”，英国殖民者在自己管辖的殖民地印度大量招募劳动力送往种植园。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的竞争日趋尖锐，英国资本在其殖民地经

营的初级产品如砂糖、咖啡、红茶、橡胶等生产规模迅速扩展，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极为迫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印度劳动人民被作为劳动力输送到了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种植园中。

第二，从印度国内来看，这一时期大量印度移民的出现，是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彻底破坏了印度基本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早在1757年，英国就开始用武力征服印度，经过一个世纪的吞并、蚕食，到19世纪末印度已全部沦为不列颠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一方面保存和利用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柴明达尔制（永久租佃制）、莱特瓦尔制（农民租佃制）搜括农民，掠夺农产品，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落，农民陷入可怕的赤贫状态；另一方面又向印度大量倾销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机器棉纺织品，摧毁了印度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破坏了建立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大量失业、半失业人口。加之英国殖民政府只顾残酷掠夺，严重破坏了印度的水利灌溉系统，使大量耕地荒芜，农业衰落，饥荒频繁，仅在19世纪后半期，印度即发生了24次饥荒，饿死2 000万人口。^④大量无以为生的劳动人民只好转向海外谋生。

第三，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移民采取的鼓励政策。为了确保英国资本经营的种植园有充足的劳动力，马来亚的殖民政府在1903年明确地提出了鼓励印度移民输入的政策，对他们实施特别的劳动立法。1907年又设立了半官方的印度移民委员会（Indian Immigration Committee），下设印度移民基金，提供移民经费，此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41年才结束，因此，马来亚橡胶园中的印度劳工得以源源而来，从而保证了英国殖民者获得的巨大利益。

印度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印度移民是从属于英国移民者利益的移民，具有典型的殖民地移民的特征：

第一，反映在印度移民的地区分布上。由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经营的时间最长，并且长期以来以印度为根据地，向周围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扩张活动，所以印度移民往往作为英国殖民者开发其它殖民地的劳动力，作为替英国殖民者服务的各类人员到了国外，形成了印度移民主要是分布在与印度邻近的各英属殖民地国家以及其它英属殖民地的分布格局。19世纪后半期以后，印度移民事实上有99.6%是在大英帝国管辖的范围内移动的。^⑤印度移民人数分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缅甸、锡兰（斯里兰卡）、海峡殖民地、毛里求斯、圭亚那以及其它加勒比海诸岛地区，其中尤以邻近印度的缅甸、锡兰、马来亚最多，占了印度移民人数的90%以上。（参见第二表）

第二，反映在印度移民的职业特点上。印度移民有两多：种植园的不熟练工人多，短期的季节工人多。锡兰的印度移民几乎全部为茶叶种植园、橡胶园、咖啡园的种植工人；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主要是充当橡胶种植园工人。据统计，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经营的橡胶园占整个马来亚橡胶园面积的3/4，而这些橡胶园中雇佣的工人有80%为印度工人。缅甸是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印度移民的大多数在仰光郊区从事农业劳动，生产大米和从事大米加工，这是因为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其经济结构也改变为以大米生产和加工为中心的单一出口经济，为了增加大米生产以供向西欧出口，英国殖民政府奖励印度人往缅甸移民。缅甸的印度移民除了从事农业劳动外，还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充当搬运、港口、铁路、人力车等行业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当然，缅甸的印度移民的经济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中的部份人已从劳动者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地主、高

第二表 印度移民的分布

1834年至1937年的移民平均数 (单位:千人)

地 区	1834—1900年		1901—1937年	
	年平均数	%	年平均数	%
亚 洲	186.0	92.2	4437	98.4
非 洲	8.6	4.3	32	0.7
美 洲	6.9	3.4	26	0.6
大 洋 洲	0.2	0.1	12	0.3
合 计	201.7	100.0	4507	100.0

资料来源:同第一表,第100页。

利贷者、工商业者,在缅甸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例如1931年仰光市税收的55.5%是印度移民所负担的。^④ 尽管如此,缅甸的印度移民大多数仍属于劳动者阶级。以1931年缅甸印侨的职业为例,在总数为53万人的男性就业者中,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占20.6万人,农业、渔业者14万人,商业从业人员8.2万人,工业从业人员4.8万人,另有职员、事务员2万人。^⑤ 锡兰、马来亚和缅甸的印度移民的职业结构,充分说明了印度移民实质上是殖民地国家为大英帝国提供的资本主义劳动力。

正因为印度移民绝大部分是往邻近各国而不是洲际移民,出入国比较方便,所以印度移民出国作短期工人或季节工人的特别多,相比欧洲移民来说,他们的定居率特别低。例如,1821年至1924年间移入美国的欧洲移民,其回国率为30%左右,^⑥ 而印度移民的回国率却高达80%左右,1834年至1937年印度移民的总数为3 000多万人,其中回国者约2400万人,净移民人数仅为600万人左右。^⑦ 这一特点也反映了不发达国家移民的外出谋生性质,他们以谋求改善经济地位为目的,一旦挣到一些钱后便回国了。

第三,反映在印度移民的来源地上。印度移民的来源地十分集中,与华侨多来自南中国的广东、福建一样,印度移民多来自南印度各省,尤其集中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地方。从移民的民族构成看,又以泰米尔族人最多,占移民人数的90%以上。据统计,仅1891年至1914年的25年间,印度移民从马德拉斯地方移向缅甸、锡兰、马来亚的人数即达到66 38 458人。^⑧ 占同一时期印度移向国外人数的70%左右。^⑨ 南印度马德拉斯地方的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农业的商品化也越来越明显。由于英国殖民者把大量廉价的稻米运到南印度,破坏了南印度原有的稻米种植经济,农民破产者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受雇的劳动力比较容易寻求,特别是外出作季节工的农民更多。^⑩

第四,反映在印度移民的移民方式上。作为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印度移民的绝大多数都是以“移民招募制”下的“契约工人”形式移向国外的。印度移民中虽然也有另一类型诸如商人那样的职业移民,或者叫做自发移民,但其数量极少,而且也决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在资本家的“招募”下移向热带殖民地充作劳动力的印度移民,才是典型的印度移民。

印度移民的招募制度又有契约苦力制度（或者叫做“负债移民”）、堪加里制度（Kangany System）以及劳务包工制（Maistry System）三种方式。“契约苦力制”移民的实际地位无异于奴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19世纪末以前往圭亚那、加勒比海诸岛以及东非毛里求斯等地的移民，绝大多数以这类移民方式移出的。由于印度人民的坚决斗争，残酷的契约苦力制度终于在1921年被废止。所谓“堪加里制度”是一种以监工头为首在国外承揽季节性劳动或暂时性劳力补充、然后招募移民前往的制度。“堪加里”为泰米尔语，即“监工”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foreman。通常的情况是“堪加里”在受到种植园主的委托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口头契约方式，招致带领亲戚朋友或乡里，到国外种植园做工，而堪加里则以长辈身份对自己带出来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监督和生活安排。这种方式的移民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正因为如此，它逐渐取代了契约苦力移民制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成为印度移民的主要方式。锡兰的茶叶种植园、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中的印度劳工，大多是采取这种方式、所谓“劳务包工制”，实际上是一种更加近代化的堪加里制度，在本质上与堪加里制度无异，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更为严密和完善。缅甸的印度移民有相当比例是采取这种方式。

印度移民大规模移向东南亚、东非和加勒比海地区，对于开发和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锡兰的茶叶、咖啡种植园、东非和加勒比海诸岛的甘蔗种植园，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印度移民的辛勤劳动才开垦出来的。例如马来亚到1910年时已成为世界首位橡胶生产国，占世界橡胶净出口量的51%，而印度移民一直是橡胶园种植工人的主体。又例如圭亚那的印度移民占了该国契约劳工移民总数的70%左右，最多时达到近24万人。他们把种植稻米和甘蔗的传统生产技术带到了圭亚那，开辟了大量稻田和甘蔗园。他们在契约期满后，大部份留在圭亚那继续务农，在种植甘蔗的同时，他们以家庭、亲戚关系为纽带建立了许多中小型稻米农场。1905年至1906年间，圭亚那从稻米进口国一跃而成为稻米出口国。现在，稻米和甘蔗仍为圭亚那两大传统农作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80%。圭亚那的开发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印度移民和其它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二、半殖民地移民类型——中国移民

与印度移民具有悠久的历史一样，中国海外移民史最早亦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唐代。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逐渐增加，到19世纪前期，东南亚国家的港口城市已形成了中国移民的居住区，华侨社会已初具规模。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下，中国沿海和边境地区的劳动人民大量涌出到国外谋生。据初步估计，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百年中，中国海外移民总数至少达到2千万人以上。^① 汕头、厦门、香港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港口，仅1876年至1939年的64年间，经由这三个港口流向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的中国移民即达到15 284 226人，其中经由汕头出国的移民达到5 697 297人，经由厦门出国的移民达到41 30 250人，经由香港出国的移民达到5 456 679人。^②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外移民不仅人数众多、规模巨大，而且分布范围超出了东南亚，遍及美洲、大洋洲、非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而奠定了现代华侨、华人社会的基础，成为中国海外移民史或华侨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向世界各地,并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特别是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在英国棉纺织品及其它工业品的猛烈冲击下,原有的手工业者、农民被剥夺了生计。在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将会被吸收到城市资本主义工业中变为雇佣工人。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发展起来,正在萌芽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又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扼杀和排挤,因此不能吸收和容纳从农村中继续不断排挤出来的破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破产者只好迁移到外地或海外谋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农民大量迁移到关外谋生,清末时,仅黑龙江省的移民就达200余万。^④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人民便利用其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与海外的传统联系迁移到海外(南洋、美洲)去谋生。这正如恩格斯在分析英国资本势力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时所说的那样:“……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⑤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是造成中国移民涌向海外的直接“推力”。

第二,正当中国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出大量失业人口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亚洲绝大部份国家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帝国主义直接把大量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加紧了对东南亚、美洲等殖民地的原料资源掠夺,因而正是它们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时候。殖民主义者从开发东南亚的过程中得出经验,华工吃苦耐劳,工效高,工资低,正是他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理想对象。例如,“过去在西印度需要使用500名黑人奴隶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糖,在古巴只需要190名中国苦力就够了。”^⑥因此,除了东南亚地区以外,美国、加拿大、加勒比海各国、南美洲、澳洲、南太平洋诸岛,甚至非洲都竞相招募华工去从事开发。

第三,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在西方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和招募中国劳动力大开方便之门。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视人民出国为不法叛逆行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承认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海外做工。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明令废除海禁。1866年,英、法与清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工。1868年,清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蒲安臣条约》),使美国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由于欧美列强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人移民到海外的数量也空前地增加了。

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分布,以东南亚地区最多、最为集中。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亚部份地区)是中国移民的中心集散地,1881年至1930年到达这里的中国移民约830万人,其中契约华工占了近600万名。^⑦大多数中国移民往往从这里转送到南洋其它地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移民在南洋各国的大致分布,可以窥见中国移民的流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马来半岛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有915 883人(包括新加坡华侨222 655人),^⑧荷属东印度群岛有56.3万人^⑨,越南有23.2万人^⑩,暹罗有270万人,^⑪此外,美国有75 994人^⑫澳洲有约

3万人,日本8 000多人,^②拉丁美洲、非洲、欧洲等地总计约20余万人。中国海外移民总共约600余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8年至1928年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中国移民流向东南亚出现又一个高潮,到1931年中国海外移民人数已达到800万人^③。总之,中国移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才基本上结束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的历史。

近代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以勤劳刻苦、聪明能干而著称于世。他们用若干代人的生命和血汗,为居住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东南亚各地的开发,美国、加拿大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开凿,非洲、澳洲金矿的开发,湄公河三角洲和婆罗洲荒野的开拓,马尼拉、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等大城市的建设和繁荣,都离不开中国移民的光辉业绩,而东南亚的锡矿业、橡胶业、糖业、米业,中国移民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是举世公认的。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这样评价:“马来诸邦专门依靠锡矿税收维持……而从一开始就作锡矿工人的首推华侨,经过他们的努力,全世界用锡的一半数量是由马来亚供给的。他们的才能和劳动,造成了今日的马来亚。”^④另一位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官员布赛尔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而“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助力(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⑤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繁荣是世界各国移民共同努力劳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移民的贡献。19世纪后半期,先后有几十万中国移民到美国,他们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垦殖荒地和建设工厂。1868年,在受雇修建美国中太平洋铁路的1.4万名工人中,有9/10是华人劳工。^⑥马克思认为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铁路的建成是和“输入了中国苦力”分不开的。^⑦美国统治阶级也承认华工对开发美国西部的重要作用:“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华工“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变成一座花园,一个果木园”,“给白人带来了牛油和面包。”^⑧

综上所述,中国移民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移民,与殖民地国家印度移民在基本性质上并无区别,而且中、印移民在地区分布、移民方式、规模、发展阶段等方面都不得不同样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影响,因而具有许多共同特点,第一、中、印海外移民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破坏了中、印两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基础、抑制和扼杀了中、印两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而产生的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所引起的。第二、中、印海外移民都集中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又各有重点分布区域,缅甸及其以西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度移民人数远远超过中国移民,缅甸以东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移民的数量又远远超过印度移民。第三、近代中、印移民的主体是以契约移民方式为主的劳动力输出。第四、在移民规模上,中、印两国移民的数量主要是取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开发殖民地劳动力的需求量。因此,近代中、印移民的最高潮,都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第五、相比欧洲移民来说,中、印移民的定居率都比较低。第六、中、印移民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为居住地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为东南亚等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资本主义国家移民类型——日本移民

日本在资本主义诸强国中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与中国、印度一样,也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全面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日本从此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避免了沦为西

方殖民地的危机。到80年代,日本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产业革命进入高潮。经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得到了割地和种种通商特权。1894年至1904年,日本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建立起来了,产业革命有了惊人的发展。其后经过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到1910年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形成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侵略欺凌亚洲近邻弱小民族,使朝鲜和中国台湾沦为其殖民地,中国东北沦为其控制的半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垄断资本又趁西方国家忙于战争的有利时机,大做战时生意发了横财,成为举世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挤进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俨然以“东洋的霸主”自居,但是,日本毕竟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很低,比起欧美帝国主义,它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以及其它方面都有重大弱点。西方国家都是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在前,产业革命在后,日本的产业革命和原始积累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其原始积累前期主要是以内部积累为主,后期则依靠其殖民政策,这就使日本资本主义在确立过程中,对国内工农劳动群众首先是对农民的剥削来得特别残酷,政府征收的高额地税,寄生地主的高额佃租,加上天灾人祸丛生,广大农民被迫弃农进城,产生出大批雇佣劳动力;其中一部份人不得不出国谋生。另一方面,日本也是依靠对外侵略战争为其资本主义发展输血的,日本对中国、朝鲜的几次战争掠取了巨额战争赔款、获得割地和通商权益。为了进一步控制和掠夺朝鲜、中国东北等地,日本政府向这些地方有计划地组织了大规模移民。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先后出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移民。20世纪10年代以前,主要的移民类型是到海外去谋求生计的劳动力移民,在本质上与同一时期中、印(度)到海外出卖劳动力的移民没什么区别,20世纪20年代以后,主要是在日本政府殖民政策指导下的政治移民,实际上是以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占领性移民。从劳动力移民到政治移民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日本从落后的亚洲国家跻身到资本主义列强这一历史过程的特点。

(1) 劳动力移民

从明治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往夏威夷、美国本土、澳洲以及东南亚部份地区,其大多数是种植园劳动力移民、农业和渔业移民。稍后,移往南美墨西哥、秘鲁的日本移民,也属于这类移民。

夏威夷是明治时期日本移民的主要地区。1885年至1900年,日本移民的重点是移向夏威夷。移民的方式主要有“政府契约移民”和“私人契约移民”两种方式。

所谓“政府契约移民”,又称“官约移民”,是日本政府与夏威夷王国在1884年签订了《日本人民夏威夷渡航议定书》,在1886年签订了《日布渡航条约》以后实行的。1885年至1894年,经由日本政府办理的“官约移民”先后共26次,共输出3万人到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做工,因此,夏威夷的日本移民主要是“官约移民”。

“官约移民”主要来自日本的广岛、山口两县,占压倒多数,其次来源于熊本、福冈县,这四个县的移民约占官约移民总数的96%。^⑩这是因为:

第一,这几个县人多地少,又是棉花等经济作物的集中种植区,但在廉价的进口棉花打击下,种棉业严重衰退,产生了许多过剩劳动力。

第二,当时的夏威夷糖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1876年,夏威夷王国与美国签订了互惠条约,美国对进口夏威夷砂糖不征关税,因而刺激了夏威夷的砂糖生产,成十倍左右地飞跃

增长。在本地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夏威夷王国曾在1886年以前从中国输入了28 408名华工,^⑩1885年—1894年又继续从日本输入“官约移民”。在产业革命与原始资本积累同时进行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到夏威夷作工,往往成为农村贫苦农民改善经济地位的一条出路。据明治24年底对广岛县移民进行的调查,该县已移居夏威夷的6 528名移民中,有74.9%的人往日本的家乡汇款,该年汇款总额达到270 732日元,相当于广岛县明治24年预算支出总额的54.3%,明治24年的调查还表明,人均汇款累计额50日元以内的在全体移民中占43.4%,50日元至100日元的占32.5%,100日元至150日元的占13%,150日元至200日元的占5.7%,350日元以上的汇款者占1.6%。明治24年时,广岛县农业雇工(年雇工)男工的月工资仅1.50日元,机织工人男工的月工资为5日元,而普通米一石的售价为6.55日元。^⑪与上述的工资、物价相比,日本移民的汇款算是相当大的数目了,因此,夏威夷成为对日本人民有巨大吸引力的移民地区。

所谓“私人契约移民”,又称“私约移民”是指由日本民间的移民会社经办、组织的对外移民。明治24年(1893年)底,日本建立最早的民间移民公司——吉佐移民会社,开始在广岛山口、福冈等地招募移民。此后,东京、横滨、神户等城市亦相继设立了移民会社,1893年以后,往夏威夷的官约移民已被私约移民所代替。

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在三年契约期满后,占很大比例的人数继续留在当地谋生。据火奴鲁鲁日本总领事馆报告,1897年底,期满后留下谋生的移民占官约移民总数的45.6%,回国者占47.8%,死亡者占7%,转往美国谋生者占3%。^⑫由于日本移民人数的增加以及移民人口的自然增殖,到1925年时,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8 068人,占当年夏威夷总人口数323 645人的40%。^⑬

1901年至1908年,日本移民的重点逐渐转往美国本土。美国在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进入美国,事实上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于是日本移民便取而代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前往美国本土的日本移民显著增加,尤其是以青年为主的海外移民趋势大为增强,还有以非移民方式往美国,或者从加拿大、墨西哥、夏威夷转道去美国的日本移民人数亦迅速增加。据广岛县统计,1907年该县赴美国的移民计3 786人,其中前往夏威夷者2 542人,往美国本土者1 244人。^⑭移民中往美国本土的比例已大大提高。到1913年,日本移民在夏威夷达88 526人,在美国本土达77 696人,^⑮人数已渐趋接近。

日俄战争后,日本羽毛渐丰,与美国的矛盾日趋加深。为了对抗日本,美国加紧排斥美国国内的日本移民。1907年至1908年,日美进行了关于限制移民问题的会谈,缔结了所谓“君子条约”(又称“绅士条约”),除了已定居在美国的日本移民的家属外,“君子条约”事实上并不承认新的劳动力移民进入美国本土。从移民的职业来看,这一时期移入美国的日本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移民,主要职业是种植葡萄、蔬菜,纽约的日本移民也主要是生产蔬菜,所以仍属于劳动力输出的性质。

除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是这一时期日本移民的主要地区以外,19世纪末开始,日本还向墨西哥、秘鲁、加拿大等美洲国家转送移民。1899年,日本有第一批移民790人到达秘鲁。到1913年,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日本移民总数已达181 212人。^⑯

在大洋洲,从1883年开始,有少量日本移民往澳大利亚的星期四岛从事珍珠贝采集业,到1897年时,星期四岛的日本移民已达1 270人,其中有约900名是采贝业者,形成了“三千里

外澳洲一角的日本社会”。^③此外,还有少量日本移民在昆士兰州种植甘蔗。1897年后,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禁止日本移民经营采贝业的政策对日本移民的入境开始加以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东南亚地区的日本移民情况有些特殊。一是这一时期日本移民在东南亚为数不多,到1913年时,总数近万人左右,^④二是移民队伍中除了劳动力和商人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娼妓,形成了一种畸形状态,日本的劳动力移民在菲律宾最为典型,他们多是从事农业、渔业和土木建筑的劳动者。例如他们在达沃(纳卯)种植马尼拉麻,在马尼拉一带捕鱼,在吕宋岛修建房屋,在本格特省修建公路等等。1913年,菲律宾的日本移民达到4 894人,^⑤其中大部份为从事土木建筑的工人,尤其木工人数最多。在东南亚,日本移民较为集中的另一地区是新加坡、马来亚。从1877年开始,日本天草、岛原一带贫穷的渔村和农村妇女源源被送往新加坡等地,被迫沦为娼妓、艺妓,并以她们为中心形成了日本移民的商业、服务行业,主要经营旅馆、餐馆、理发店、游乐场所以及服装店、杂货店等。日本妇女大量输出到国外做娼妓,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极其丑恶的一页。1902年统计,新加坡的日本人计851人,其中娼妓611人。^⑥到1914年新加坡、马来亚的日本移民总数达到2 327人,其中娼妓1 684人,^⑦仍然呈现以娼妓为主、以为她们服务的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为辅的畸形移民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西欧宗主国无暇东顾之际,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南来东南亚的日本商人迅速增加,日本移民成份开始发生变化。到1920年时,日本为了维护“一等国”的荣誉,在东南亚厉行“废娼”,从此,日本移民便变成以商人等为主要成份了。

从上述日本移民的状况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移民的大多数仍属于劳动力移民。与印度、中国的劳动力输出相比较,日本移民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日本的劳动力移民是在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过程中产生的,基本上属于经济性质,且多是出自移民本身的意愿,相对地说移民方式亦比较自由。而日本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移民提供了一定的资助与保护,不象印度和中国那样,其移民带有劳动力强迫输出的性质,缺乏近代国家权力提供的援助与保护。第二,中、印移民的主要流向地是落后国家,日本移民的主要流向地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国外较高的收入和待遇是吸引日本移民的主要动力。第三,从数量上说,日本移民与同一时期的中、印移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军国主义的扩张,日本移民队伍中又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移民,使早期的劳动力移民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 政治性移民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在使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同时,开始计划移民,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向它占领下的朝鲜、台湾、中国东北(满洲)以及库页岛等地移民1 753 322人。^⑧这种移民虽然也打着“友好亲善”、“经济开发”的幌子,但绝不同于早期的日本劳动力移民。它是日本政府组织的向海外殖民地的移民,它是以日本的殖民统治为基础,以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训练,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性移民。这种移民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加强殖民掠夺,带有强烈的军事殖民性质。

1904年5月,日本提出了所谓《关于对韩方针的决定》,在其详细纲领中拟定:要通过大批日本移民控制朝鲜农业。1909年,日本在着手进行“日韩合并”的过程中,又提出“尽可

能多地向朝鲜移民,以加强日本势力。”^④据统计,1910年朝鲜的日本移民达到17万多人,^⑤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并朝鲜后,于1912年进行所谓“土地调查”,要重新确认土地所有权。在此过程中,日本殖民者不断强行吞并和霸占朝鲜人土地,组织大批日本移民移入朝鲜获取掠夺来的土地。到1919年,朝鲜的日本移民达到近35万人。^⑥

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移民,企图永久“经营满洲”。早在1906年,满铁株式会社刚刚成立,就提出了要在十年内向满洲移民50万人的计划。于是,日本移民首先向南满进发,后又逐步扩大到黑龙江地区。1907年,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有37 885人,在1917年已达10万人。^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的日本移民已增加到24万人。^⑧“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整个东北沦于日本统治之下,日本移民更加横行无阻地大规模进入东北地区。1934年和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在长春先后两次召开“移民会议”,提出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居计划》草案,计划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计500万人。该计划并被列入日本政府确定的“七大国策”之中。此后,打着各类旗号的日本移民便纷纷进入东北各地。主要有以下几类移民:①“集团开拓民”,是移民的主要形式,是由日本政府直接组织的,每一移民农户可以得到890日元的旅费和津贴。这类移民的前身是日本的武装移民,后改为“集团移民”,主要成份为退役军人和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壮年,每200户或300户组成一个开拓团或开拓村,重点安置在中苏接壤的2 000公里地带,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②“集合开拓民”,为一般性移民,或称自由移民,由民间自己组织,政府补贴较少,其成份有退伍军人,也有一般的老百姓,一般以50户至100户为一单位,这种移民通常被安置在所谓“开拓第二线地带”,即在集团移民区的后面。③“分散开拓民”,三五十户为一单位的分散移民,其成员多为日本国内的失业者。④“铁道自警村”移民,由“满铁”组织,这种移民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兼有“保护”铁路的任务。⑤“义勇队开拓团”,主要是青少年义勇队成员,经过训练和学习后,大部份被安置在战备地区。

然而,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所谓“五百万移民”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据日本外务省调查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东北的开拓团有1 131个,日本移民人数计有270 428人。^⑨战后,这些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的“移民”纷纷返回日本,日本殖民者庞大的侵略性移民计划也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四、小 结

综上所述,近代中、印移民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属于经济性质的和平移民,这与欧美殖民者抱着征服和掠夺的目的,依靠军事政治力量到落后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可以说,近代中、印移民是典型的东方移民。

日本移民与中、印移民又有区别。日本是后起的亚洲资本主义强国,它的移民兼具东方落后国家移民和西方列强国家对外殖民的双重特点。但是,日本移民人数极少,对外移民的历史也很短,又受到本国政府的资助与保护,后来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它不足以代表或说明东方移民的真实情况,中国移民、印度移民才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帝国主义要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首先必须以低廉价格购买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为达到这一目的,帝国主义使用各种手段(甚至军事侵略)强迫中国等亚洲国家自由

输出劳动力。而资本对劳动力来说,只要哪里有廉价劳动力市场,资本便在哪里购买劳动力商品,而不论劳动力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在东南亚“就地取材”、购买当地原住民族的廉价劳动力,而要舍近求远去获取中国、印度的移民劳动力呢?笔者认为,除了中、印两国在地理上与东南亚邻近、在历史上有传统的交往关系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第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东南亚的加剧掠夺,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勉强维持半殖民地地位以外,其它都先后沦为不同形式的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并不是要使东南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使东南亚变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为此,他们与这些国家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土著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关系,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封建生产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国家的农村仍是封建、半封建地主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缓慢、软弱,因此没有直接促使农民阶级的迅速分化和农村中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大量的当地原住民族的雇佣劳动也就无从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殖民主义只有从外部输入劳动力以满足需要。第二,中、印移民劳动力价格低廉和相对容易管理。移民劳动力来到异国谋生不能取得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因此也缺少讨价还价的资本;况且,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由移民本国负担,劳工在移居前就在本国学会了一定的生产技能,而在他们丧失了生产能力之后又可返回本国。在经济景气时可以大量招雇他们,榨取其剩余价值,而当经济衰退时又可以将负担转嫁到移民劳动力身上。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时期,东南亚的华侨工人、印度工人曾被大量遣回祖国就是一例。至于移民劳动力容易管理,那是因为各国的移民法对移民的行为都有严格限制,稍许“越轨”就会被驱逐出境。总之,正因为殖民者雇佣移民劳动力比之雇佣当地原住民劳动力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更为有利可图,所以5 000万近代中、印移民才能来到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方。

注 释

①Brinley Thom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1961, 第12页。

②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水牛出版社,第107页。

③戴维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口》,普林斯顿,1951年,第99页;金田卫二:《印侨概说》,日本《神户外大论丛》第1—3号,第324页。

④《世界近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6页。

⑤戴维斯:上揭书,第99—100页。

⑥、⑦金田卫二:《印侨概说》,上揭杂志。

⑧A. M. 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1936, 第49页。

⑨K. Davis: *The Popul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1951, 第99—100页。

⑩转引自〔日〕杉原薰:《印度移民与种植园经济》,《社会经济史学》第47卷第4期,1981年,第17页。

⑪根据戴维斯上揭书,第99页计算。

⑫游仲勋:《资本主义各国劳动力的国际移动》,日本《熊本商大论集》第30号,1970年3月。

⑬游仲勋:《华侨经济的研究》,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69年,第24页。

⑭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第1版,第467页。

⑯克里门蒂:《英属圭亚那的华工》,第9章。

- ⑪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杂志，1980年第4期。
- ⑫《南洋年鉴》1951年版，第58—59页。
- ⑬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39页。
- ⑭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117页。
- ⑮《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
- ⑯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中译本），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第350页。
- ⑰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307页、第344页。
- ⑱〔日〕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岩松堂书店，1939年，第82页。
- ⑲F.A.Swettanharm, British Malaya, Lodon, 1929.
- ⑳Victor Purcell, Malaya, 第128页。
- ㉑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中译本），第95页。
-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第1版，第340页。
- ㉓美国参议档案报告第680号，第48页、第53页。
- ㉔〔日〕儿玉正昭：《明治时期日本往美国的移民》，《社会经济史学》杂志，第47卷第4期，第75页。
- ㉕〔日〕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和文化摩擦》，岩南堂书店，1983年，第437页。
- ㉖儿玉正昭：上揭杂志，第88页。
- ㉗《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828页。
- ㉘〔日〕安里延：《日本南方发展史》，东京三省堂，1941年，第462页。
- ㉙儿玉正昭：上揭杂志，第95页。
- ㉚〔日〕小野一一郎、前田昇三：《日本的移民问题》，《经济评论》1955年8月号。
- ㉛小野一一郎等：上揭杂志。
- ㉜〔日〕入江寅次郎：《明治南进史稿》，东京井田书店，1943年，第177页。
- ㉝小野一一郎等：上揭杂志。
- ㉞同㉜。
- ㉟〔日〕绫部恒雄、永积昭编：《新加坡》，东京弘文堂，1984年，第196页。
- ㊱〔日〕清水元：《战前日本人经济在新加坡、马来亚的进出形态》，《亚洲经济》杂志，1985年第3期，第16页。
- ㊲小野一一郎等：上揭杂志。
- ㊳万铎：《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 ㊴㊵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 ㊶井上清：上揭书，第261页。
- ㊷石方：《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外国移民》，转引自田方等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
- ㊸《满蒙终战史》第812页，转引自《伪满洲国史》，第345页。